

共匪「文化大革命」與「奪權鬥爭」

陳 彬

自從毛匪推行「三面紅旗」暴政失敗以後，大陸上的反毛反共運動，實際上已經不斷地而且加速地擴大和發展。五十四年一月，毛匪召開匪黨中央工作會議的「討論紀要」中，已經供認其黨內出現了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」，「這些當權派，有在幕前的，有在幕後的」。「而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，有的在下面，有的在上面」。「在下面的，有已經劃了和漏劃了的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；在上面的，有在社、區、縣、地，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」。其後，匪又供認：這些「當權派」結合了匪黨內外的反毛和反共勢力，採取「打着紅旗反紅旗」的手法，進行「篡黨、篡軍、篡政」，「搞復辟、搞顛覆、搞政變」，其嚴重性已經發展到威脅匪幫面臨「亡黨、亡國、亡頭」的危險情勢，毛匪為求自保，所以才發動了這次以「文化大革命」為名的政治大整肅。

從這次運動中所顯露的事實看來，毛匪所指的「當權派」，就是指以劉少奇、鄧小平為首的一切反毛派。由於多年以來，劉鄧實際主持匪黨工作，不但掌握了黨、政、財、文等大權，而且勢力雄厚，黨羽遍佈各地區各部門，甚至僞都北平也在劉派主將彭真的「完全控制之下」，「連一根針也插不進去」，使毛匪也感到「無可奈何」。正因為北平已經被反毛派所控制，所以毛匪才被迫離開北平去上海，依靠林彪的軍事力量，發動了這次生死存亡的大鬥爭。

這次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是毛匪於五十四年十月開始發動的，鬥爭的矛頭，首先就是指向彭真所控制的「北平市委」，經過了七個月的批判和鬥爭，到去年六月初才把彭真鬥垮下來；接着，又先後鬥垮了匪黨中宣部、僞文化部、以及各地文教宣傳系統的負責人。可是接替彭真的李雪峯，仍然是屬於劉派的主將，且與此同時，劉鄧派也利用了這次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派出了「工作組」，到各地去進行「形左而實右」的反擊。直到七月底毛匪返回北平，於八月初召開匪黨「十一中全會」，才發動「砲轟劉鄧司令部」，通過了

「文革決定」十六條，並且改組了匪黨中央的領導機關。改組結果，雖然林彪取代了劉少奇獲得毛匪繼承人的第二號頭目的地位，但是劉鄧也仍然保留了「政治局常委」的職位。「十一中全會」後，毛匪進一步發動「紅衛兵運動」，利用一批大中學生，到處進行「鬥、批、改」和「破四舊」的瘋狂暴行，各地黨政機關和文教系統的領導幹部，都普遍遭到點名批判和公開侮辱，但同時也引起各地反毛「當權派」的強力反擊，挑動羣眾鬥羣眾、學生鬥學生，到處發生流血衝突事件，把「革命羣眾」打成「反革命」。到了十月下旬，毛匪召開匪黨中央工作會議，劉鄧才被迫在會上作了「自我檢查」，「承認錯誤」；毛匪也在會上自承：「我在十一中全會提議通過的文化革命十六條決定，這個決定是否能實行，說句老實話，我本人也沒有信心。」「希望各位能突破難關，不然我本人亦要受苦。各位為此而搞得手忙腳亂，我本人也是如此」。到了十一月下旬，毛匪第八次接見「紅衛兵」，並且指派其妻江青擔任匪軍文化工作顧問以後，從十二月開始，形勢突然轉變：一方面毛匪發動「紅衛兵」開始逮捕彭真、陸定一、羅瑞卿、楊尚昆等人，舉行公審鬥爭；同時把「文化大革命」，由黨政機關和文教系統進一步推向工礦企業和農村擴大進行；另一方面，劉鄧及其他反毛派為求自保，亦於此時發動「經濟主義」攻勢，對毛林集團進行「新反撲」，從上海、南京首先發難，迅速蔓延到各地，掀起所謂「十二月的黑風」，到處發生工人罷工、北上告狀、城市「三停」（停水、停電、停交通），農村「三光」（分光、吃光、用光）等嚴重現象；同時，毛林集團的陶鑄（新任匪黨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宣部長、中央文革小組顧問）亦於此時被指為遵從劉鄧路線而遭受攻擊和鬥爭。這一突然的轉變，迫使毛林集團不得不緊急應變，發動各地許多「造反派」，掀起所謂「一月革命」的風暴，由號召「反對經濟主義，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」，發展到呼籲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」，「展開一個羣衆性的全面奪權鬥爭」，並且指令各地公安部門加強特務鎮壓，指

令各地匪軍積極支援「造反派」的「奪權鬥爭」。與此同時，朱德、賀龍等匪軍頭目亦被指為參加策動去年「二月政變」而遭受攻擊和鬥爭，匪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「全軍文革小組」組長劉志堅亦被罷黜，並於一月十一日改組「全軍文革小組」，由江青任顧問，徐向前任組長，但改組後不到一週，新任組員唐平鑄、胡痴又遭受攻擊，顯示毛林集團及匪軍內部已經呈現了分裂現象。另一方面，各地反毛「當權派」亦紛紛組織所謂「紅色政權保衛軍」「赤衛隊」「榮復軍」「捍衛團」等團體，對「造反派」進行「反奪權鬥爭」；各地轉業復員軍人亦紛紛成立所謂「紅衛軍」或其他名義的獨立組織，參加反毛活動；東北、西北、西南、內蒙等許多地區，更先後發生反毛派軍事割據和武裝衝突事件。

據一月十二日匪「人民日報」和「紅旗」雜誌的社論指出：「革命戰士每奪取一個堡壘，都會遇到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抗。他們總是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。硬的不行來軟的，武的不行來文的，軟硬兼施，文武並用。……現在，他們以極「左」的面目出現，假惺惺地打起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的旗號，蒙蔽和欺騙一部份羣衆，……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」。又說：「當前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份子，正在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分子、投機倒把分子、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分子，互相勾結起來，用經濟主義來煽動羣衆，破壞生產，破壞財政金融、破壞文化大革命，向中國共產黨進行鬥爭，向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鬥爭。」

一月廿二日匪「人民日報」的社論又指出：「爲什麼當革命的左派，瞞準當權派發出第一砲的時候，就被打成『反革命』『右派分子』？爲什麼當工作組來了以後，革命左派反而更變本加厲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殘酷鎮壓？爲什麼當廣大革命羣衆起來揭露和批判反動路線的時候，却發生了更大規模的羣衆鬥爭的事件，甚至武鬥流血，多少革命的鬪將受打擊，遭迫害，被開除，被鎮壓，直到最近，又出現了反動路線的大反撲，出現了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大泛濫？幾個月的反復和曲折，一場場驚濤駭浪的階級鬥爭暴風雨，深刻地教育了廣大革命造反派。他們越來越明白了：革命之所以受挫折，只是因爲印把子沒有操在自己手裏。那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，就是因爲他們還有權！」

從以上這兩段事實表明：毛匪推行了一年多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經過了「一再的「反復」，到頭來還是「受挫折」；不但反毛派的「權」無法完全奪過來，甚至還促成黨內反毛派同社會上的反共勢力進一步大聯合，而對毛林集團發動「更大規模的「大反撲」；由於雙方都是打起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的旗號，更使這場鬥爭陷于十分尖銳複雜的大混戰狀態。

目前毛林集團在「奪權鬥爭」中，所採用的策略和手段，主要是：

一、高舉毛匪思想「紅旗」，組織「造反派」，號召「大聯合」，進行「聯左、拉中、打右」，爭取大多數，加強團結，集中力量打擊「當權派」。

二、要求「分清敵我」，「區別對待」，對反毛派進行分化、誘降、孤立、爭取、威嚇、鎮壓、軟硬兼施，各個擊破。

三、運用文鬥、武鬥、點名批判、大鳴大放、大字報、大辯論、大民主、大串連等形式，進行「鬥、批、改」，把「當權派」澈底「鬥倒、鬥垮、鬥臭」。

四、充分揭露和批判「當權派」的「反動路線」和「反撲陰謀」，號召「抓革命、促生產」，展開「反經濟主義鬥爭」，要求「節約鬧革命」。

五、展開「羣衆性的全面奪權鬥爭」，加強公安工作，並指令匪軍積極支援「造反派」奪權，實行由下而上，一個一個奪取，一個一個鞏固。

六、建立「三結合」的領導核心，實行「造反派」、省委內擁毛負責人 and 匪軍負責人「三位一體，聯合奪權」，並成爲奪權後臨時權力機構。

七、奪權前，先掌握報社、電台、公安局，堅決鎮壓「反革命」，依靠被奪權單位內部的「左派力量」，團結中間力量，堅決打擊「最頑固的反動力量」。

八、奪權後加強「促生產」，區別對待「當權派」和幹部，採取「一抓（逮捕）、二罷（罷免）、三提（提拔）、四留（留用）、五調（調離）」方針，分別處理。

這些策略手段，歸根究底，還是靠「槍桿子」。毛匪早就說過：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」，「槍可以造黨，造幹部，造文化，造民衆運動」。這次毛林集團在「文革」過程中，所製造的「紅衛兵」「造反派」「羣衆運動」「奪權鬥爭」等等，實際上都是靠「槍桿子」製造出來的。

現在，「當權派」雖然是處於挨打地位，但是毛林集團也存在許多不利的因素：

第一、匪幫原有各級組織，都是「當權派」所掌握，由於遭受毛林集團打擊，都變成反毛派，爲了自保，並且進一步同社會上的反毛反共勢力匯合，形成多數派，毛林集團還是少數派。

第二、毛林集團在這次鬥爭中，實際上是以軍整黨，以軍整政，以軍整軍，這無異是與其黨政軍各級組織和黨員幹部爲敵，自絕於自己往日的伙伴，必然造成衆叛親離，自陷孤立。

第三、毛林集團所製造的「紅衛兵」「造反派」都是一些無知青少年和少數盲從分子的烏合之衆，缺乏鬥爭經驗，又缺少有能力的幹部和專門人才，可以用來接管和經營原有各單位的業務和工作。

第四、毛林集團所使用的策略手段，原是匪幫所慣用的一套技倆，自然很容易爲「當權派」所識破而加以反擊，「當權派」也同樣打起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的旗號，正是「以牙還牙」的做法。

第五、毛林集團的「反經濟主義鬥爭」，實際上是反對廣大羣衆希望改善經濟生活的基本要求，這種違反人民利益的鬥爭，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而且必然引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。

第六、毛林集團受到反毛派利用經濟福利而掀起的「大反撲」，已經使其工農業生產、財貿金融和交通運輸，陷於混亂癱瘓，嚴重損失，這種經濟危機，勢將引發更大的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。

第七、毛林集團及匪軍內部已經出現了分裂現象，而且劉、鄧、朱（德）、賀（龍）等人，在匪軍中也仍有雄厚的勢力，毛林集團對匪軍仍無法完全控制，最近許多地區匪軍公開反毛，即爲明證。

第八、最近在「造反派」內部，已經「出現了小團體主義、分散主義、無政府主義、極端民主化、山頭主義、非組織觀點、本位主義、自由主義等傾向」，甚至組織渙散、工作消極、意見紛歧、紀律蕩然，這更是毛林集團的致命傷。

目前，毛林集團雖然誇稱北平、上海、黑龍江、山西、貴州等省市已經取得了「奪權」的勝利，並且在北平、上海成立了「人民公社」，但是大多數地區仍無法完成「奪權」，已經被奪權的單位，也仍有反復的現象。同時

，各地反毛「當權派」也在積極展開「反奪權鬥爭」：仍然運用他們手中所掌握的權，把「造反者」打成「反黨」「反革命」；或是「打着紅旗反紅旗」，鑽進「造反派」裏，挑起內鬨，製造羣衆鬥羣衆；或是導演「假奪權」，佈置親信以「極左」面目起來奪權，實行「假接管，真保權」；或是「自動讓權」，溜之大吉，把爛攤子往「造反派」肩上推，造成「造反派」困難；對於已經被奪權的單位，則佈置另外一批假「造反派」起來再奪權；或是從事破壞活動，把已經被奪權單位搞亂搞垮，使其無法繼續維持生產和工作的正常進行。更嚴重的，是結合反毛的匪軍，形成半割據，打擊「造反派」，製造流血事件。此外，則繼續利用經濟福利的手段，鼓動工農羣衆罷工罷耕，分光吃光，四出串連，北上告狀，把矛盾「上交」，以圍困「中央」，增加對毛林集團的困擾。二月四日匪「解放軍報」亦供認：「這些當權派，正在製造不安和構成矛盾。他們並利用他們在黨內的權力，滲透革命陣營，然後在內部從事煽動，使中國大陸發生內戰。」（引自合衆社報導）顯示由於匪軍介入「奪權鬥爭」，情勢更呈緊張，到處發生「武鬥」，實際上已經是陷於半內戰的狀態。這種情勢，繼續發展，更將不可收拾。

由於反毛派的頑強抵抗，更加毛林集團及匪軍內部亦出現了紛歧、散亂、內鬨、叛離等嚴重不穩現象，最近毛林集團已經被迫於二月十二日前後，先後發佈命令，停止「紅衛兵」步行串連，解散未獲毛林「中央」承認的一切「革命羣衆」組織；通令匪軍在海空軍及軍以下部隊暫停展開「四大」（大鳴、大放、大字報、大辯論），並要求所有參加地方「文革工作組」的匪軍人員應一律返回原工作單位。同時，匪黨中央亦曾於二月十二日發佈命令，禁止「造反派」及匪軍當局，不得任意剝奪犯有過錯的匪幹的黨籍，對有關黨籍問題的處理，應延緩到運動後期再按照匪黨黨章的規定進行。

綜合以上所述，可見毛林集團仍是面臨強大阻力，危機四伏，並沒有取得「徹底勝利」的可能。而且由於這場鬥爭，已經導致匪幫內部的大火併、大分裂、大動亂，統治機器被打破，經濟基礎被瓦解，如火燎原的反毛反共革命運動正乘機加速擴大發展。今後匪幫內部鬥爭，不論誰勝誰負，都將兩敗俱傷，其結局終將促成大陸革命與國軍反攻提早結合，形成內外夾擊，一舉推翻匪偽政權，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。